



本色

丹剧的动静，历史在聆听。
——题记

□ 范德平 李明明 朱旭海

第二章 “啮当”化蝶 妙生丹剧

1949年4月下旬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渡过长江天堑，向全国进军。

5月初，丹阳宝塔弄5号“戴家花园”成了上海战役总前委的办公地。邓小平、陈毅等众多将领和战略家在这里运筹帷幄，为解放上海、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基石。丹阳这座古老的城市，迎来了全新的生活。人民当家做主，欢欣鼓舞，共同迎接崭新的时代。

春风骀荡，阳和启蛰。丹阳人民满怀翻身的喜悦，结合庆祝节日和为政治运动服务，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。生活成了大舞台，扭秧歌、打腰鼓，这些充满民间风情的活动成为大家的最爱。在排练中，人们脸上洋溢着喜悦与期待。那鲜艳的服装、激昂的鼓点，是对生活的赞美与歌颂。当秧歌队伍舞动起来，那如行云流水般的动作，犹如一条彩带在风中摇曳，让人们眼前为之一亮。码头工人、机米厂的工人，他们不仅在码头上、工厂里扛起重担，亦在舞台上演绎着人生百态。他们将民间传统节目舞龙灯、荡湖船搬上舞台，成为华美的一幕。龙，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民族的图腾，象征着刚毅与不屈。湖船，则代表着柔美与浪漫。丹阳第一个国庆文艺汇演的舞台精彩纷呈，各行各业排演了近百个文艺节目，类别五花八门，有歌咏、秧歌、莲枪、腰鼓、京剧、话剧等，国庆前后在工厂农村上演了数十场。水电公司水厂职工组织话剧团，演出的《未开出的列车》，医学院教职员和学生联合演出的《思想问题》等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丹阳土生土长的“啮当调”当然是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“啮当调”作为流传于丹阳地区的地方性曲艺，之所以能够实现向丹剧的转型，并得到新中国文化体制的承认与接纳，是因为“百花齐放”的文艺方针。

1951年5月5日，周恩来总理签发了《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》，戏剧界称为“五五指示”。中央政府正式以公文的形式鼓励地方性小剧种的发展，明确提出：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、改造与发展，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，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。地方戏尤其是民间小戏，形式较简单活泼，容易反映现代生活，并且也容易为群众接受，应特别加以重视。翌年秋季，文化部组织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，毛泽东主席亲自出席，并题词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。在大会的闭幕式上，周恩来总理充分肯定了地方戏存在的价值：“我们第一次戏曲会演所呈现的就是‘百花齐放’。因

为中国极大部分戏曲，都是地方戏。京剧与地方戏各有各的好处，所以要提倡‘百花齐放’。”“五五指示”和“百花齐放”方针潜移默化地推动着“啮当”说唱向丹剧的转化。

生活在新中国的人们安居乐业，给“啮当”艺人带来了更多的演唱机会。艺人或在场馆坐唱，引得观众满堂喝彩，或结伴走唱，行吟于大街小巷十里八乡。总之，“啮当”说唱在丹阳十分活跃，盛传不衰。

家住延陵季子庙附近的陈金堂，从小父母双亡。11岁那年，耐不住饥饿，他手持一根青竹棒，伴随“啮当”说唱的盲人充当侍童，走街串巷，讨得三餐粗茶淡饭。他眼明手快脑子灵活，耳濡目染中慢慢从“啮当”滩头和本头上学到了很多东西，算是开蒙。后来又专门拜师学艺，尽洗乖声，终入堂奥之门，“啮当”说唱诸多曲目烂熟于心。1952年，陈金堂应征入伍，参加抗美援朝战争。作为第三批入伍志愿军新兵，在苏州木渎集结受训三月。这期间，他还为战友们演唱过“啮当”滩头《杨家将》等曲目。陈金堂的演唱风格属于西部“啮当”，他的爱女陈玲梅1947年出生，生下来的时候近乎全盲。陈玲梅从小跟着爹娘“沿门卖唱”，晓得“啮当调”宛如人生，有喜有悲。她习唱“啮当”，得到父母亲炙，勤学苦练，声腔稍有讹错，少不得戒尺的责罚。由于她天资聪颖，对东西部“啮当”说唱板式和唱法兼收并蓄，并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。陈玲梅后来成了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“啮当调”的代表性传承人。

瓦工出身的卞扣宝，虽长期处于社会底层，甚至没有进过几天学堂，但不是一个蠢鸡瓮里的生人。他勤于自学，有一定文化素养，在“啮当”传习总所时，曾被公推为“啮当”艺人总领班。他不仅自己能唱，还着手整理“啮当”曲目。他的代表曲目有《杀狗记》《磨糠记》《长工记》《大红灯》《小红灯》《桂花亭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卞扣宝一直没有中断“啮当”曲目的传习工作。后来，他听说丹阳文化部门要在“啮当”说唱的基础上创建丹剧，主动献出了所有保存的“啮当”曲目手抄本20余部，还亲自演唱《磨糠记》，为丹剧提供了一部完整的录音资料。

“啮当”唱的是丹阳人自己的调，好听生动又上口，越来越多的人热爱上了这门说唱艺术。

(八)



从明代“国道”看地方交通

□ 张剑 马彦如



以道路为基本条件的交通体制既是统治阶级的生命线，也是社会文化的血脉。

明代商品经济发达，工商业城市繁荣，商业资本十分活跃，交通便利而繁忙。地扼长江、运河之汇的镇

江，自古为“舟车络绎之冲，四方商贾萃而错处，转移百物，以通有无”，是明代全国著名的33个工商业城市之一。

驿道，在古代又称官道，是因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需要，国家在各地开辟的主要通道，相当于今天的国道。沿驿道设立的驿站，是驿道与驿道之间的连接点、古代的交通枢纽，也是官办邮递和来往官差途中歇宿、换马、补给的场所。客观上，驿道成为联系各地之间水陆交通的重要纽带。

随着商品流通的日益扩大，驿道自然地成为东西南北土商行旅往返及各地货物往来的重要通道。明代一统，驿道自京师（北京）可直达浙闽。如从京师到南京、镇江，由始发地北京出发，经固节驿、涿鹿驿、汾水驿、归义驿等30余驿，至应天府江东驿及龙江驿，再经句容县龙潭驿，至镇江府京口驿，全程2490华里。反之由镇江府经南京（应天府）至北京亦同，是一条连接冀鲁皖苏四省的陆道通衢。

明代东南手工业发达，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成为商品，并越来越多地销往外地，如棉布、丝绸等被大量运销西北。丝绵等大宗商品自产地苏州府、松江府发运，多经镇江府转运、转贩陕甘境内。如取陆路仍循应天府至北京的驿道，北上至安徽宿州睢阳驿分路，折西经河南商丘驿、开封大梁驿、郑州管成驿、洛口驿、函关驿，进入陕西境内的潼关驿、华山驿，至西安府京兆驿。江南多水，与去北方及西北选择相反，自镇江以下赴浙杭，则多取水（驿）道，抵达目的地。

明代驿道（国道）畅通四达，连结驿道的各地驿站设施在元代已具规模，明代更趋完备，并在元代基础上进一步完善，设有陆驿、水驿和水陆驿。陆驿沿陆路而设，备有车马，水驿沿河道而设，备有船只，水陆驿则兼顾之。除房舍及水陆交通工具外，馆驿中还设有驿丞、攒典等职官，另有馆夫、房夫、门子、马夫、驴夫、船工等服役人员。

早在元代，过往镇江府境的驿道交通就很繁忙，元《至顺镇江志》卷13就有“兹郡乃当孔道，送往迎来，辙相结而舳相衔也”的记载。明正德《丹徒县志》卷8则有元政府在京口录事司（镇江城区）

设丹阳驿，站址在千秋桥西，南为中门，东西列二馆，“使客之驰驿而至者，则西馆处焉，其乘舟而至者，则东馆处焉”，有馆舍109楹、马厩45楹，备船30只、马80匹规模宏大的记载。

朱元璋建明后除弊兴利，去苛从简，对驿站进行调整裁并，在江苏境内共设站30多处，镇江府设三驿，即京口驿、炭渚驿和云阳驿。其中，府城的京口驿站是水陆相兼的大站，明初设于京口闸西，明英宗天顺七年（1463年）“徙于洗马桥东”。明世宗嘉靖中规模复大，有驿船10只、驿轿10乘、马驴10头。京口驿是通连两京（北京、南京）和浙闽的水陆要驿。

除国道外，尚有连接地区与地区之间的道路，如镇江府至徽州府，需由丹阳南下，先走一段水路，经横塘铺、珥村、荆成港、金坛、湖溪、溧阳、三塔荡，至苏皖交界处的梅渚；接着走一段旱路，经建平、十字铺、姚村、汪溪、宁国、胡乐司，到达徽州。这条线路相比经南京、马鞍山、芜湖、宣德以达于宁国及徽州要便捷得多。

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除驿站外，镇江府内全境还广设递铺。递铺古称邮，是与驿站平行的邮传组织。一般在府前设总铺，然后分为东西南北各路，十里一铺，依次传递。据明正德《丹徒县志》载，镇江府治并丹徒县立铺十二：府前总铺（在府治西）、西津铺（北渡江至瓜洲）、西门铺（在西三里冈）、七里店铺（在七里桥）、乐亭铺、洪信铺、高资铺、炭渚铺、陶巷铺、三里冈铺（在南三里岗）、流水冈铺、陆成铺等。此外，这些递铺线路除有的借行驿道，多数会使用较为畅达的县道、乡道，作为沟通府城与四乡集镇之间的地方孔道。

明代驿道和驿站的持续发展，为镇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助力，也为明代江南经济的勃兴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

清 周镐 京江二十四景图册之林开古驿

由腔成调、由调成曲、由曲成剧，是一个时代成全了丹剧。